

国共关系史上划时代的一页

——香港海员大罢工探论

葛坤英 周文顺

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于1924年,而两党在实际斗争中的合作却早在1922年初就开始了。是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正是在国共两党合力推动下取得胜利的。长期以来,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有关论著中却忽略了这一史实,仅视香港海员大罢工为第一次工运高潮的起点。笔者认为,此说缘小而失大。应当说,它不仅是第一次工运高潮的起点,同时也是国共两党在实际斗争中合作的起点。

一 香港海员大罢工 是在国民党的影响下发动的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与广东海员的联系由来已久。这也是国民党早期活动的特点所决定的。国民党的前身兴中会、同盟会皆建立于海外,华侨有产阶层在其中占很大比重,这就使频繁的海内外联系成为早期国民党活动的一个基本特征。有人仅就孙中山本人做过统计,在其革命生涯中,他曾先后4次横渡太平洋、印度洋,6次横渡大西洋,数十次往返海内外^①。海员是维系海内外联系的重要媒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重视海员运动是很自然的。据中共党史资料所记,早在辛亥革命前,他们就设法在工人中传播其思想和影响^②。并在工人中发展盟员、建立组织,依靠他们传递消息、运输军火。辛亥革命成功后,还曾有一批功勋海员上岸担任重要职务^③。香港海员大罢工,正是在这些组织和党员的直接领导下发动的。

首先,罢工的发起机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是国民党领导的。关于这一点,在中共早期党员陈公博、张国焘的著述中可以得到佐证。陈公博《我与共产党》一文这样写道:“那次的罢工本来是国民党的联谊社主持,来粤之后,共产党遂于中加紧活动。”^④陈公博是当时中共广东党组织重要成员,身临其境,他的回忆应当比较可信。但“联谊社”为何物?张国焘《我的回忆》有这样的叙述:早在1913年,孙中山于“二次革命”失败后,即在日本横滨领导一部分中国海员成立了“侨海联谊社”,1914年又成立“海员公益社”,此后,为推动国民革命,孙中山将总社移设香港,更名为“海员慈善社”。“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的名称是由孙中山所亲命,工会牌匾也是孙中山亲手题写^⑤。而据《孙中山年谱》所记,那时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已经在国民党广东军政府内政部注册登记。1921年2月28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成立典礼,孙中山还亲自派代表赴港参加^⑥。

其次,罢工的主要领导者是国民党人,国民党在罢工工人中影响颇深。香港海员大

罢工中最著名的中坚领导人为苏兆征、林伟民。应当指出，目前史学界仍有人认为他们当时即是中共党员^⑦，这是严重失实的。事实上，林伟民、苏兆征是分别于1924年和1925年加入共产党^⑧，当时，二人均为国民党人。而且，他们与孙中山同为广东香山县人，私交甚笃，早在辛亥革命前就追随孙中山参加了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尤其苏兆征，是1908年加入同盟会的国民党元老，孙中山建立海员联谊社、海员公益社均以此人为骨干分子^⑨。而在香港海员大罢工中，苏兆征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代理会长兼总务处主任^⑩，林伟民则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第一任干事兼与港英当局谈判的首席代表^⑪。他们在整个罢工运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罢工的发动、发展、直至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国民党在普通罢工工人中的影响亦非同小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目睹了这次罢工，据他1922年发表于《共产国际》的论文所述，罢工期间，国民党的领袖每天都与罢工者取得联系，他们以各种方式支持海员斗争，“在海员中进行的宣传非常成功，以致广州、香港及汕头的罢工者全部要求加入国民党。”^⑫同年7月，马林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的正式报告中，则进一步肯定：广州、香港、汕头三地已经有一万二千名海员加入国民党。他自称和那里的国民党领袖天天接触，认为“整个罢工都由这个政治组织（指国民党）的领袖们所领导。罢工工人参加了党的民族主义的示威游行，全部财政资助都来自国民党。”^⑬

据各方面的资料记载，直到罢工前夕，中共未曾在海员中建立任何组织^⑭。在香港其他行业中，也是以国民党为主^⑮。

二 在中共推动下 香港海员大罢工轰动全国

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中共并不因其受国民党领导而存门户之见，而是义无反顾地给予热情支持。

那时国民党在广东颇有声威，但它所领导的职工运动多带有行会色彩，会与会之间极少联系，更谈不上与外地沟通^⑯。这就必然地限制了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不易获得全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与国民党相比，中共在广东力量虽微不足道，但就整个社会而言，它在劳工界的影响却远非国民党所能及。中共“一大”以后，便在上海建立了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该组织上与赤色职工国际相联系，下设分部于北京、济南、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分部又与各地工会发生联系，涉及铁路、航运、矿山、冶炼、土木建筑、邮政市政等各个方面。仅就铁路而言，就分别于京汉、京绥、正太、津浦、道清、粤汉、京奉各路段建立了工会组织^⑰。为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加强各地联系，中共还有针对性的创办了一批工人夜校和工人刊物。从香港海员大罢工前夕来看，中共已领导了几次大规模工人运动，计有1921年8月和10月的上海英、美烟厂工人两次罢工^⑱，10月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1月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12月汉口人力车工人大罢工^⑲。而其中陇海铁路罢工涉及郑、汴、洛，远及徐州，声势浩大，对香港海员罢工的发生有重大影响^⑳。

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后，中共是全国各党派中率先发起支持的政治力量。中共中央领导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时向各地工会分发了援助香港海员的通知。党的刊物，如

上海的《劳动周刊》、北京的《工人周刊》、广东的《群报》等等，也分别发表了大量声援香港海员的文章^⑲。党中央机关在经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印制了5千份传单，广东党组织也印制了3千份传单，在社会上广为散发^⑳。正是在中共的全力推动下，一时各地“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纷纷成立，援助香港海员的通电、宣言、文告遍及全国，整个社会出现了援助香港海员的热潮。

在北方，铁路工人尤为突出。由于中共活动的深入，京奉、京汉、京绥、陇海、正太等路段均成立了“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㉑。他们郑重宣言：“虽远在北方，服务铁路，也要尽一切力量援助香港海员达到目的……向外国资本家宣战”^㉒。他们不仅从道义上支援，并积极募捐，给香港海员以经济援助。北京长辛店工人甚至在火车头上竖起“援助香港海员”的大旗，往返募捐于京汉全线。沿途工人纷纷效法，在社会上引起巨大轰动^㉓。在华东，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也亲自出面，发动上海人民援助香港海员，并一再致电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鼓励他们“坚持到底，勿擅让步。”同时，还派代表专程前往香港、广州，将上海各界人民的捐赠直接送达罢工海员^㉔。在南方，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州分部直接投入了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接待工作，尽可能地解决罢工海员的食宿问题，给他们以经济援助。广东党组织下属的全部党团员均走上街头进行宣传、讲演。著名共产党人谭平山在广东党组织机关刊物《群报》发表了《港政府枪毙华工》一文，大声疾呼工人杀开血路，死地求生，与资本家进行殊死斗争。并鼓动国民党广东政府“以光明磊落的态度，发表堂堂正正的主张”，象苏维埃俄罗斯那样支持工人^㉕。尤其当罢工海员的要求遭到港英当局拒绝后，中共充分发挥其宣传优势，在香港各行各业鼓动同情、援助。1922年2月出现的香港总同盟同情罢工，正是中共推动的结果^㉖。那场罢工斗争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在香港史无前例。邮局、银行、酒店、茶居、街市一律停业，“连住家的使役、女仆、厨司、轿夫、园丁以及水底电线工人，山顶电车夫、报馆、印刷局、轮渡夫役、饼干店伙友、面包工人、公事房使唤人、牛奶房工人都加入罢工。弄得财主佬家里，饭没有人烧，火炉没有人发，小孩啼哭没有人理，全市关门闭户，秩序大乱。”^㉗

三 广东政府成为香港海员 大罢工的重要依托

在整个香港海员大罢工中，国民党广东政府的依托作用不容忽视。

首先，罢工的指挥机构设在广州，广东政府为它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这对于指导整个罢工运动正常发展非常重要。

香港海员大罢工发生以后，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承受着极重的压力。那时的香港，海上运转业在远东已是首屈一指。海员罢工，不仅对香港，甚至对整个世界都造成了强烈震动。据1922年2月中旬统计，仅外国船只，因罢工而被迫停泊于香港的就有130艘。其中英国82艘、日本15艘、荷兰11艘、美国8艘、挪威7艘、法国4艘，此外还有丹麦、葡萄牙、暹罗等国的船只^㉘。正因为这样，罢工风波乍起，各国资本家均对海员工会怀着极端仇恨，无不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一方面挑动部分市民围攻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一方面以大炮、机关枪对着总会机关，强行摘走总会牌匾，逮捕罢工领袖。同时又在香港全市宣布戒严令，将中国各口岸所有英国军舰调集香港，以全部海、陆军警

巡察街道。遇工人队伍便枪击驱散，甚至禁止饭店为聚集在一起的工人们煮饭^①。在此情况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是无法正常工作的，罢工工人们也纷纷离港回省。因此，在广州成立罢工指挥部非常重要。

据文献记载，当时的香港海员罢工指挥部就设在孙中山总统府附近。下设总务科、财政科、粮食管理处、纠察队、宣传队、慰问队、骑车队、招待处等，甚至还有几十所宿舍和专门的食堂。办事很有条理，颇能照顾全局^②。显然，机构这样健全的罢工指挥部，不仅在中国，即使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也属罕见。如果没有广东政府的支持，显然是不可能的。由于将罢工指挥部设在广州，大批罢工工人回到广州，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才得以运用封锁香港的“饥饿政策”对付港英当局。香港孤悬海外，粮、菜一向靠内地供应。海员罢工，海运停顿，港英当局曾派军舰到广州采买，但在罢工指挥部的封锁下，竟使一粒米、一茎菜不得渡港^③。

其次，广州政府曾给罢工以重要的经济援助。香港海员大罢工历时56天，最初人不过数千，后来高达10万。筹办这么大规模的罢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经济上断难胜任。固有的资金储备，甚至不够支付工人们离港回省的车费；国内外捐款，大多被港英当局扣压。工人罢工，工资全无，时值隆冬，饥寒交迫。正是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广东政府的财政资助起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当时，广东政府每日向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拨款数千元，前后共10万元。正是赖此源源不断的接济，罢工才得以旷日持久地坚持下来。据《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所记，罢工期间，工人们尚可维持一日两餐，每餐一角的基本生活水准。工会最初还能给每人发一件棉衣。外省在港海员特受优待，甚至还可住小旅馆，有棉被。每天还配给5分钱的烟钱^④。如果没有固定的经济援助，工人们连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也不具备，罢工的胜利是很难想象的。

其三，广东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支持海员罢工。据谭平山所述，港英当局制造沙田惨案镇压海员大罢工工人，广东政府挺身而出，发表了抗议书^⑤。旧中国政治黑暗，国家刑律赫然载有罢工治罪之条文，一个资产阶级领导下的地方政权，面对帝国主义淫威，竟如此不畏强暴，公开站出来为工人撑腰，的确难能可贵。正因为这样，工人们广东政府也给予信任。例如，2月7日，海员工会通过决议案，决定成立由劳、资双方代表组成的“公断处”全权讨论解决罢工问题。决议案明确指出：“公断处设在广州……由下列人员组织之：一、广东政府代表，二、英国总领事代表，三、西船主代表，四、华船主代表，五、海员代表……公断处人数由广东政府与香港政府商议后决定。”^⑥而事实证明，广东政府不负厚望。在此之后，它堂堂正正地派出代表和工人们一起与港英当局进行了多次谈判。直到港英当局签字答应条件而后已^⑦。

四 中共击败港英当局招工阴谋

海员大罢工发生后，香港百业俱废，全面恐慌。港英当局为破坏罢工，先是调停，继而镇压，种种企图失败后，使出了招募新工的伎俩。1月底，香港宝泰公司（英国买办控制的职业介绍组织）发出急电，指使它在上海、宁波等地的代理人招募新工，速运香港^⑧。

旧中国经济困顿萎缩，加之长期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造成了大批手工业和民族工业凋敝。致使东南沿海沉淀着庞大的劳动后备军，仅香港一地经常失业的海员就有一、二

万之多³⁹，这种状况为资本家招募新工提供了条件。在早期的劳、资斗争中，资本家以此手段对付罢工，无异釜底抽薪。例如，1914年，浙江一带海员为提高工资而罢工，资本家就曾雇广东海员代替其工作，从而使浙江海员由罢工而失业，工资未能增加，又陷无业之苦。并由此造成了浙、粤海员间的长期不睦⁴⁰。

香港资本家故伎重演，在海员心理上造成强大压力。事实上，数天之内，他们已经在上海招募了1千多名新工，准备开往香港⁴¹。因此，能否击败港英当局招工阴谋，成为香港海员大罢工成败的关键。

但是，当时的香港海员工会与浙系海员素无联系，而国民党在劳工界的影响也仅限广东一隅。情势紧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寄希望于中共，主动向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出告急电，请求援助⁴²。劳动组合书记部则责无旁贷地指令各地机构，组织上海、宁波一带的失业海员拒绝招聘，从而在这场斗争中起了力挽狂澜的作用。

上海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援助香港海员大罢工的群众运动盛况空前。在这场斗争中，党中央印发了大量传单，党的刊物发表了大量文章，党的活动家纷纷走上街头募捐、讲演。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所记，从1月25日开始，租界内各水手介绍机构就频频收到书面警告，其中措词严厉，晓以利害，告诫不许破坏香港海员罢工。甚至有“违者以葬身南海对付”等语⁴³。使大小工头不寒而栗，视招工赴港为危途。据《民国日报》报道，1月27日，中共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李启汉在上海发起成立“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由于中共在劳工界的广泛影响，参加该会的有“工界协进会，上海南市均安水手公所，上海焱盈南社，焱盈总社，黄胜和水手馆，林广、同庆、陈秉记等处。”⁴⁴这些均为浙系海员中强有力的组织。共产党人李启汉当选为该会主席。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上述各地海员组织采取联合行动，一致抵制港英当局在上海、宁波一带的招工活动。并对海员受雇情况进行了普遍调查，在普查的基础上列出名单，制成表格，逐个进行劝阻工作。李启汉并身先士卒，亲赴码头发表演说，呼吁工人团结斗争，使上千名受雇于港英当局，整装待发的新工顷刻瓦解。只有极少数前往香港。李启汉等共产党人又专程前往香港进一步劝阻，同时向香港海员转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上海各界人民对香港海员的同情和支持，解除他们的顾虑，鼓励斗争到底。正是在这场斗争中，李启汉等共产党人被捕入狱。罪名是“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的活动”⁴⁵。

由于中共卓有成效的活动，使上海、宁波一带海员空前团结，工贼不敢妄动。港英当局破坏罢工的最后希望破灭了。

五 以香港海员大罢工为转机国共两党主动寻求合作

综上所述，应该得出结论：香港海员大罢工是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的基础上而取得胜利的，1922年初，国共合作已经局部开始了。只是这时的合作，并不是发自两党的主观愿望，而是一种无意识的“殊途同归”。

出现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只要留心两党的纲领，就不难发现，二十年代初的国共两党在政治上是颇具共识的。中共“一大”纲领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并以工人运动为中心任务；而国民党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亦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并同情工人运动。因此，尽管那时两党在主观上没有进行过任何协商和制定有关国共合作的文件，但一经触

及实际斗争，双方各自根据本党纲领采取行动，便不可避免地“殊途同归”。并且在客观上，两党各尽所长，彼此呼应，配合得相当默契。这次配合，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从此，两党开始走上主动寻求合作的道路。

从文献资料看，香港海员大罢工之前，中共对孙中山国民党是持不合作态度的。“一大”决议对现有政党的态度是：“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它党派建立任何关系。”^{④⑥}而“一大”纲领则将“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作为首要任务^{④⑦}。显然，在此前提下，中共与孙中山国民党不仅没有合作的余地，国民党领导的广东政府甚至还成了中共“推翻”的对象。至于国民党对中共的态度，也无从谈合作。尽管孙中山运筹革命，胸怀颇大，不乏“联合”谋略。但稍加留心便知，他的“联合”，只用于具有武装力量的军阀和会党，对于一般纯政治力量，他只许加入国民党，决无联合可言。当时中共刚刚建立，人不过百余，枪没有一支，且无合法地位，而孙中山自视为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④⑧}，以他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以大党自居，根本看不起中共，甚至不承认中国有共产党存在^{④⑨}。

但是，经过香港海员大罢工的实际合作之后，国共两党却以惊人的速度联手并进了。1922年3月，香港海员大罢工胜利。同月，中共开始酝酿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⑤⑩}。4月，中共为召开全国劳动大会而于广州举行党的会议。会议认为，统一全国工运，不能不联合在广东工运中具有深刻影响的国民党，从而初步决定了同国民党联合的策略^{⑤⑪}。而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对共产党刮目相看。国民党元老张继说，香港海员大罢工以后，孙中山经常教育他身边的国民党人：“我们很多年革命，不曾成功，今天看来，主要由于没有广大群众。共产党是有群众的党。我们从惠州起义以来，好几次动员人，却寥寥无几，可是事实证明，共产党在全国的力量比我们大。”^{⑤⑫}不仅孙中山，连后来顽固反共的张继，当时对中共也不无敬畏，他甚至担心中共瞧不起国民党^{⑤⑬}。

1922年5月1日，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是中共发起并领导的，但却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广州市召开^{⑤⑭}。会前，中共热情地向国民党发出邀请，而国民党也欣然派代表参加。参加这次大会的成份极其复杂，有国共双方的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无政府主义的代表、各地区、各行业工会团体的代表等等。但在众多党派团体的160多名代表中，中共推举的主席团名单，却只有国共两党的代表^{⑤⑮}。大会自始至终都在共产党主持下进行，而国民党却始终如一配合到底。中共领导人还曾邀请孙中山莅会讲演，孙中山虽未到会，但却由衷地祝贺大会成功，并希望切实执行大会通过的决议^{⑤⑯}。而这些决议大都是由共产党人拟定的。这一切说明，以香港海员大罢工为契机，国共两党各自克服了传统的偏见与保守，已经达到了彼此间的理解和信任。并且，已经在事实上走入“联合战线”的轨道。

注：

①《中山先生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②《“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

③《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3页。

④陈公博《我与共产党》·见载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册，第223—253页。原著写于1943年，收入陈公博回忆录《寒风集》甲编。

⑤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18、219页。

- ⑥《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2、275页。
- ⑦见《中华民国简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页。
- ⑧《中国革命史辞典》·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5页；《简明中国近现代史词典》·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438页。
- ⑨《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卷第93页；第3卷第68、69页。
-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香港海员大罢工)·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原著写于1930年。
- ①同注③，第96~101页。
- ②《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1页。
- ③同上书，第15~17页。
- ④文虎《苏兆征同志传》·中华全国总工会1930年版。
- ⑤⑥同注⑤，第220页。
- 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31、164页。
- ⑩《李启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页。
- ⑪《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页。
- ⑫罗章龙《椿园载记》第134页；《谭平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1、242页。
- ⑬1922年6月《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 ⑭《北方的红星》·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6页。
- ⑮同注⑰，第134页。
- 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同注⑱，第53~55页。
-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谭平山文集》第241、242页。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香港海员大罢工)。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同注⑱，第56页。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㉑《“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24页。
- ㉒同上书，第485页。
- 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同注⑤，第213、224、225页。
- ㉑《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求实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
- ㉒㉓同注⑱，第693页。
- ㉑上海《中报》1922年4月22日。